

东南亚华文诗歌复杂的文化认同

——以若干代表性诗歌为例

陈涵平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中文系, 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在流散生活中,文化认同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现象。从东南亚华文诗歌若干代表性文本来看,这种复杂性主要体现为认同迷失、认同分裂、认同持守、认同新建等几个方面,对这种复杂性的原因进行分析,既有利于我们准确地解读流散书写,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流散生活,还能从某一侧面挖掘海外华文诗歌的经典意味。

〔关键词〕流散;文化认同;东南亚;华文诗歌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4)01-0007-08

“认同”(identity)一词二十多年前从西方世界进入中国文化研究领域时,很多人也把它译作“身份”。此后,人们大都把文化认同和文化身份当作同义词交替或并置使用,较少有人关注两者在语义及语用上的细微差别。我们认为,这两个同出一源的词语在不同的语境使用时应该有不同的意义。当它作为“身份”含义出现时,应该算作名词,主要指“某个个体或群体据以确认自己在特定社会里之地位的某些明确的、具有显著特征的依据或尺度,如性别、阶级、种族等等”^[1],它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与他者区别开来的主要因素;而当它以“认同”的面貌出现时,则应该是动词,指某一个人或群体对自身身份的追寻、确证、重构或新建的种种过程。因此,“身份”是静态的,是一种可以名状的生活情态;“认同”是动态的,是一种不断延展的生命流程。由此可看出,identity不仅仅具有“身份”与“认同”两种内在的语义向度,也因此同时具有两种外在的实践维度——一种面向

过去和现在(历史和传统)的身份确认与一种面向未来和他者的自我认同。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界定文章的题旨。本文以“认同”为主要论述对象,就是要通过若干代表性文本来揭示海外华人不断寻找、重构文化身份的动态过程,而不是对移民们既有的文化身份进行静态分析。这种动态的文化认同用西方学者霍尔的话来说“是一种不断延续的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2][212]}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移民的流散性质和认同的先决条件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因为从文化实践看,“认同”的前提必然是“辨异”,没有文化主体从原有共同体的“逸出”,没有文化“他者”从共同体外的刺激和冲撞,就很难产生新的身份追求。而移民作为典型的流散群体,他们不断地从旧有的“想象共同体”中飞散,迁徙到各种陌生的异质性文化环境中,这种变动不居的移民生活不断地催生出他们对“认同”的新关切、新思考和新建构。正如有学者指

〔收稿日期〕2013-08-25

〔作者简介〕陈涵平(1964—),男,湖南汨罗人,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艺学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批准号:11&ZD111)。

出“流散不过是对一种固着状态的离弃。而越是流散,越是陷于属性上的分裂、破碎和不确定,对于一致和统一的追求和追问便越是强烈。”^[3]

对流散生活进行形象书写就产生了流散文学,因此,流散文学就是漂泊者的文学,是身份游移者的文学,也是持续追求归属和不断寻找认同的文学。流散者在不断地“流亡”中观察着并体验着世界的格局转换、文化差异和价值冲突,同时也不断地遭遇着认同的困惑、移易和新变,因此,认同问题便成为流散书写应有的题中之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认同是移民文学的中心问题,对于认同的关切支撑着移民文学的存在”^[4]。

然而,尽管我们在许多时候把移民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但实际上移民内部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不仅不同民族的迁徙大不相同,即使同一民族内部的移民个体也命运迥异,因而很难构成完全同质的移民共同体。以东南亚华人为例,移民时段的不同(有早期移民和近期移民之别)、移民方式的不同(如有婚恋移民、资金移民、技术移民、政治流亡等)、移民背景的不同(如中国大陆移民、港澳台移民和来自其他国家的再移民),尤其是在移居国命运遭际的不同,这一切都在不同程度上稀释了其文化认同的母体基础和共同趋向,从而导致其认同出现复杂多样的局面。对此,长期研究海外华人生存状况的华裔学者王赓武曾说过“在散居海外的华人中出现了五种身份:旅居者的心理;同化者;调节者;有民族自豪感者;生活方式已彻底改变者。”^{[5]184}这一观点基本上概括出海外华人因流散过程中的个体差异而出现的认同复杂的状况。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海外华人的复杂认同自然也会在华人移民的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来。这种反映不仅在叙事容量较大的小说、散文中有比较集中而深刻的体现,而且在抒情性较强的诗作中也有细腻而形象的展示。许多流寓海外的诗人用诗歌这一特殊的审美方式书写着他们流散的经历、情感的变化和精神的波折,其中自然包括关于认同的种种思考。本文选取东南

亚这一特定区域中华文诗歌的代表性文本进行解读,力图从中窥探出这一区域一代代华人在遭遇身份问题时种种复杂的选择,进而提炼出移民们在面对认同困惑时所展现出的带有普遍性的情感经验和精神轨迹,以及由此而凝练出的某些经典意味。

一、认同迷失

认同迷失指的是流散者在寻找身份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无所适从或无所归依的精神状态。这一状态的产生或许有主观或客观的种种因素,但其前提都是既有身份的失落和新的身份尚未形成且难以寻觅。这种认同的失落或惶惑也许在每一个流散者的身上都出现过,无论他是被迫流亡还是主动放逐,是已经改籍还是等待换籍,都会陷入一段精神的“空巢”期。失落无疑是一种痛苦的体验,身份的失落加上认同的迷惘,更是作为双重痛苦凝固为流散者的内伤而被久久舔舐。正如当代后殖民理论大师爱德华·赛义德在一篇题为《流亡的反思》的文章中所说“流亡令人不可思议地使你不得不想到它,但经历起来又是十分可怕的。它是强加于个人与故乡以及自我与其真正的家园之间的不可弥合的裂痕:它那极大的哀伤是永远也无法克服的。虽然文学和历史包括流亡生活中的种种英雄的、浪漫的、光荣的甚至胜利的故事,但这些充其量只是旨在克服与亲友隔离所导致的巨大悲伤的一些努力。流亡的成果将永远因为所留下的某种丧失而变得黯然失色。”^{[6]173}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即使流散会有所收获,但与流散带来的极大哀伤相比仍然黯然失色。

也许,大多数流散者都会与赛义德感同身受,马来西亚华文诗人方昂的一首诗歌《给HCK》,曾让众多吟诵过它的移民潸然泪下:

又有人说我们是移民了/说我们仍然/
念念另一块土地/说我们仍然/私藏另一条
脐带/这是一个风雨如晦的年代/该不该我
们都问自己/究竟我们爱不爱这块土地/还
是我们去问问他们/如果土地不承认她的
儿女/如何倾注心中的爱? /

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不是/说我们是支那人,我们不是/说我们是马来西亚人,谁说我们是/说我们是华人,哪一国的国民?/我们拥有最沧桑的过去/与最荒凉的未来^[7]

显而易见,诗歌用十分痛切的语言表达出“不知自己是哪国国民”的身份尴尬。诗人作为从中国走出的移民后代,迁徙到马来西亚,并获得该国的国籍,原本以为自己拥有了新的身份,却不料现实与理想截然不同——新的身份并不被赐予者认同。于是,一种身份迷失的痛感油然而生。

诗歌以沉重的叙述开篇,一个“又”字劈空而出,暗示出身份歧视的频繁出现。这种歧视源自于人们心目中的“移民原罪”,即对移民是否忠诚于移居国的高度质疑。因为在移民目的国的人们看来,移民作为“非我族类”的外来者,始终会心系他们的故国,情迷原有的文化,而不可能真正忠于新的国度。因此,即使移民获得了迁居国的国籍,他们仍然会“身在曹营心在汉”,而始终存有异心。基于这样的歧见,他们便对移民的归化一直抱有戒心和疑虑,于是,移民身份的悲剧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这种悲剧的本质就是认同的迷失。移民们从祖籍国——中国走出来,来到一个新的国度,自然想通过国籍的改变来拥有更好的生活。这一行为本身说明,他们已主动放弃了中国国籍。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他们已不再是中国人。然而当他们完成了国籍改变之后,马来西亚人并不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同胞。最终的结果是:他们什么都不是!异乡,正如卡夫卡笔下的城堡,而移民,则是那个永远难以接近目标的测量员,只能永远在故乡和异乡之间的苍茫背景上漂泊,永远没有一个栖所安放自己飘荡的灵魂。

毫无疑问,这种身份的丧失给诗人带来了巨大的伤痛。这种伤痛在诗歌中转化成难以压抑的愤懑,于是诗歌中便有了“我们”与“他们”的强烈对峙,有了否定与反诘的不断叠现。在强烈的节奏和短促的声音中,诗的结构渐由沉重的叙述转化为愤怒的呼喊,最终在悲怆的总结中达到高潮。

然而,如果仅仅只是情绪的宣泄,这就不是——一首具有经典意义的好诗。这首诗能够被广为传诵,恰恰在于它在艺术上有诸多过人之处。首先是多种表达手法的运用,使短短的篇幅具有较大的容量。全诗将叙述、议论和抒情融为一体,通过暗示和并置,折射出广阔的精神纵深。其次,诗歌注重声音的变化:指陈与慨叹、质疑与诘问、选言与断言、反观与自省,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扭结成一场震撼人心的心灵对话和思想争辩,每一种声音背后都隐藏着巨大的无奈和痛苦。再次是层进式结构的营造。诗歌由现象的描述进入到情感的激荡,最终升华为命运的总结,层层递进,环环相扣,情绪的跃动既汹涌澎湃又脉络鲜明。最后两句既成为水到渠成的结点,又是诗人对流散生活的彻悟,它将过去与未来联系在一起,既富有强烈的历史感,又饱含对宿命的无奈。最后是丰厚的意蕴场域的构建。诗歌用鲜明的节奏、短促的声音、变换的语气以及“脐带”等意象的设置,共同构成了情感的张力和意义的空间,让人在玩味再三时不断地产生心灵共振。

总之,这首诗既展现了流散生命在巨大的动荡和失落中的伤痛,又凸显出诗人在持续的“寻找/迷失”中不断加速的情绪积累和血脉贲张,最终流露出在精神和生存上双重的难以安栖的荒原体验。种种情感的变化,将流散者在身份缺失时的心灵轨迹描画得触目惊心。

二、认同分裂

认同分裂是指身份选择处于相互矛盾、难以选择的冲突状态,这种状态往往源自于文化主体的不确定心态,即在身份塑造过程中,个体对于自己文化属性的确认难以把握,似乎左右为难、进退失据,或者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从而形成一种混杂、怪异、冲撞、裂变的多重动态身份。

这种认同的分裂在流散过程中常常出现,这是因为流散生活是一种不确定的生存状态,流散者在不断地迁徙中遭遇着不断变换的陌生环境,以及由此而产生不断变化的心理认知。

而外在环境(包括各种人、物、处所等)在拉康的“镜像”理论中,即是与“自我”主体对应的“他者”,是主体认识自我的必要参照。拉康认为,自我不可能孤立自足地显现,自我只能在与另一个完整的对象的认同过程中得以确认,自我的构成离不开想象的他者的存在。因此,自我与他者之间是一种想象的主体间关系。而由于自恋性的在场与影响,这一想象的主体间关系不可避免地表现为一种你死我活的争斗,这种争斗使自我最终成为深陷于文化之中并被文化构造和颠覆的分裂欠缺的主体^{[8]268-275}。由此可以推断,移民们处在一种不断改变甚至与内心世界持续分歧、对立的环境中,往往难寻一个统一和不变的自我身份,因而只能处于一个分裂的认同之中。

这种分裂的认同之殇在新加坡诗人梁钺《鱼尾狮》一诗中有过经典的呈现:

说你是狮吧/你却无腿,无腿你就不能/纵横千山万岭之上/说你是鱼吧/你却无鳃,无鳃你就不能/遨游四海三洋之下/甚至,你也不是一只蛙/不能两栖水陆之间/前面是海,后面是陆/你呆立在栅栏里/什么也不是/什么都不像/不论天真的人们如何/赞赏你,如何美化你/终究,你是荒谬的组合/鱼狮交配的怪胎/我忍不住去探望你/忍不住要对你垂泪/因为啊,因为历史的门槛外/我也是鱼尾狮/也有一肚子的苦水要吐/还有两眶决堤的泪……/^{[9]99}

众所周知,鱼尾狮是新加坡一个带有标志性的人造旅游景点,并在多年的宣传与渲染中逐渐成为具有图腾意义的国家象征。有论者专门对鱼尾狮的“生命史”进行过梳理,并得出这样的结论“鱼尾狮有着五彩缤纷的魔幻张力:从神话传说到现实打造,从文学虚构到反思现实,再从现实仿制到精神/文化认同的强化等。鱼尾狮意象实在令人眼花缭乱又兴味盎然。”^[10]正是这样一个意蕴丰富的雕塑,引来众多文学家的关注,可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在诗人梁钺的眼中,鱼尾狮又含蕴着怎样的独特意味呢?答案是不难寻找的,因为诗人在诗歌的结尾明白无误地告诉读

者“我也是鱼尾狮”。因此,诗人是以同病相怜的心态来看待鱼尾狮的。两者感同身受的交点就在于:鱼尾狮与移民都是荒谬的组合、杂交的怪胎!

这一怪胎之怪首先体现在形体的残缺。当众多观赏者专注于狮头鱼尾的奇妙组合之时,作为流散者的诗人却另辟蹊径地发现,这一合成是以丧失为前提的。狮头下面是鱼尾,意味着狮身狮腿的丢弃;鱼尾上面是狮头,意味着鱼头鱼鳃的阙如。以两个残缺不全的形体拼贴成一个全新的物体,不可能有自然天成的新质,只可能有强扭成形的怪异。这多像移民啊,许许多多移民曾经感叹:当他们通过飞翔而获得广阔的天空时,不也同时失去了坚实的大地吗!

这一怪胎之怪其次体现在功能的丧失。狮是山中之王,此刻却失去了纵横千山万岭的双腿;鱼是水中之仙,此刻却失去了遨游四海三洋的双腮。诗歌用三个“不能”揭示出这个组合体在拼凑过程中抛却固有功能的真相。通过象征手法的运用,使人们在想象的还原中领略到这一雕塑在形体的分裂中还隐含着内在功能的丢失和生命能量的萎缩。事实上,这一世相也是许多移民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与孕育生命力的文化原乡决绝,来到处处陌生的异域,又有几个移民能有如鱼得水的快乐、如虎还林的潇洒?

这一怪胎之怪再次体现在空间的固化。诗歌描写到,鱼尾狮“呆立在栅栏里”,前不能入海,后不能进山,只能枯立岸边,终日吐着苦水。这一状况,恰恰是移民边缘化生存的一种镜像。对于移民边缘化的生存状态,曾有学者(如霍米·巴巴)认为是一种富有创造力的“第三空间”,我们认为这只是看到了事物的一面。还有另一面尚未揭示的是,流散者如果移徙到一个并不宽松的异质环境,如果异质文化不断地对边缘地带进行挤压,如果边缘生存者并不具备文化融合和文化创造的足够能力,这样的第三空间还有可能出现吗?

正是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揭示,诗人从鱼尾狮中窥探出自我的命运,即“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像”的杂交怪胎。而“一肚子苦水”“两

行决堤的泪”则意味着诗人对“移徙”与“混杂”这种现实境况的强烈否定。从中可见,诗人在用身体进行流浪的同时又用理智否定流浪,在热切投入他乡的同时又接连遭遇抗拒,在有意接纳他种文化的同时又无法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诗人就是在这多重矛盾的揭示中,逐渐将异乡的雕塑演化为移民的镜像,让人们从怪异的组合中看到了流散者的现实苦难和内心扭曲。这种苦难在“历史的门槛外”一句中达到极致。因为移民们不仅在现实境况中遭遇两难处境,而且连历史的正常书写都无法进入,这应该是最富于悲剧性的认同缺失。现实和历史的双重否定,导致诗人与周围环境的阻隔与分离,这种处境给诗人的身心带来了巨大的伤痛,而伤痛的变形表现,就是诗人自我认同的分裂,这一点深深地影响了诗人,使得诗人眼中的鱼尾狮成为“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的矛盾体”。

三、认同持守

认同持守是指在身份选择过程中对既有身份的坚持和守护,是一种固守历史的文化姿态。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在《人的研究》一书中曾指出,人的身份主要有两种:天赋身份和获得身份,前者是先天赋予或与生俱来的,包括人的种族、肤色、性别等,它是人不可选择、不可逃避的身份内涵;后者则是后天获得的,是在技术进步和社会组织增加的过程中不断添加于人的结果^{[11]68}。本文论及的认同持守,主要是指流散者在移徙过程中对天赋身份的固守、突出和强调。

这种持守往往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人类的本能欲望,根据心理学的观点,人类具有自我探寻、自我确认的本能,这种本能促使人类对自己或祖先的出生地,以及民族的发源地总是怀有一种天然的眷恋,因此,“怀乡”作为人类一种最普遍的情感,已经历史地沉淀为文学创作的母题,东南亚华文诗歌自然也不例外。二是“他者”环境的逼迫,游子们来到陌生的异域,如果遭受异质环境的强烈挤压,不断地被边缘化或胁迫式同化,作为一种应激反应,对“民

族共同体”的想象便浮出水面,于是,“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生存环境中,意念中的‘乡土’从乡音到山川、往事,不仅是人情的自然牵挂,而且是抵御自我迷失的良药。”^{[12]192}在这里,“怀乡”已进一步演变为与“他者”相抗衡的精神武器,以及弥补认同匮乏的想象行为。

在东南亚华文诗歌中,表现认同持守的作品可以说比比皆是,马华作家何乃健曾在《脐带》一诗中表白“时刻抗拒着锋利的剪刀……永远以这条脐带去吮吸母体里蓄了五千年的蛋白质”,菲华作家谢馨则在诗作《中国结》中倾诉“啊!中国/你是我潜意识最深陷的恋母恋父情结/……中国啊!中国,我痴迷地模拟你/汉唐的风华!”另一位菲华诗人苏荣超也曾写下同名诗作《中国结》,含蕴深刻、别具一格。全诗如下:

东方的一条巨龙/纠缠着我你的/亲情
百结/应是故乡又似异域的一刻/已不是王
彬街的马蹄得得/一种红的颜色/流入长江
黄河/最终流入我的血管/编织出一个/既
复杂又简单的/情结/一边是壮观河山/一
边是柔情美丽/^[13]

全诗短小精悍,却令人玩味。诗人首先采用了虚实相间的手法,将作为物件的中国结和作为情感的中国结融合在一起,交错呈现,大大拓展了诗歌的阐释空间。作为实写,诗歌完整地铺陈出“中国结”的形成过程:一条红色的如巨龙一样的长绳,通过既复杂又简单的方法,编织成一个浑然一体的大结。而作为虚写,长长的绳带是东方巨龙——中国的缩影,鲜红的颜色是长江、黄河孕育而成的母体的血液,纠缠萦绕的绳结是游子挥之不去的怀乡之情。诗歌以“结”为诗眼,将绳结与情结缠绕在一起,似乎处处写实,又似乎处处写虚,从而使诗歌平添了许多艺术魅力。

其次,诗人运用妥帖的意象营造,将广阔的时空与丰富的情感包蕴在凝练深致的意境之中。首要提及的是,“中国结”本身就是一个笼罩全诗的意象,它所具有的千千丝结象征着海外游子对故国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深切思念,这种意绪贯穿全诗,使诗作本身也像一个缠绕延

伸、回环往复的情结,从而使象征主体穿透于诗人、诗作、诗情之间,产生珠联璧合、浑然天成的效果。除此之外,诗作中的“东方巨龙”“长江”“黄河”“王彬街”也都是具有不同含义的意象。东方巨龙应是中国的象征,长江、黄河则象征着滋养其子民的文化传统,而王彬街,则是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城中的一条唐人街,它本身就是一位华人的名字命名,后来逐渐发展为华人聚居且颇具中华特色的一个特定区域。作者置身于这样一个充满故土气息的场所,在“应是”“又似”的犹疑中似乎产生了空间的幻觉,欲把他乡作故乡。然而王彬街毕竟是异国他乡的一块特殊“飞地”,它的存在与发展凝聚着以王彬为代表的无数华人的心血,渐渐远去的“马蹄声”就是华人们为所在国奋斗与牺牲的印证。这里,空间的变幻又带出时间的延展,这种时空的跨越在意象的驾驭下巧妙而又自然。

此外,让人击节称赏的还有最后两句的神来之笔。这看似平常的收束实际上颇具匠心。首先它巧妙地与诗题呼应:壮观河山——那是“中国”,柔情美丽——那是情“结”,如此一来,全诗便有一脉贯通、凝练圆合之美。其次它又是全诗的总结与升华:壮观河山——因为凝聚着长江、黄河的神采,柔情美丽——因为饱含着无穷思念的情怀。这样落笔,既展现出全诗丰富的情感铺垫,又为全诗留下了百转千回的悠长余味。

人类学家泰勒说过“为了保持自我感,我们必须拥有我们来自何处,又去往哪里的观念。”^[14]东南亚华文诗歌中表现出来的对故国的思念、对中华文化的持守,就是华人移民通过不断地确认自己“来自何处”来达到保持“自我感”的目标。这种努力,从人的生存需要上看,是流散者面对“他者”环境强大的排斥压力和信息包围时,试图消除不安全感并寻找心灵归宿的必然选择。拓开而言,在物质文明日益发达的当下,一切固有、稳定且相对安全的地域性家园日渐被工业化、信息化的虚拟社会所取代,现代人愈来愈缺乏归属感,愈来愈像失去家园的弃儿。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家园的憧憬,对自我的认同,对既有身份的持守,已不仅仅是一种

对地理空间的记忆与期盼,更是一种对精神家园的向往与皈依。

四、认同新建

斯图亚特·霍尔在指出“身份是一种‘生产’,它永远处于过程之中”的同时,还进一步分析到,身份是在不断寻找、适应、重构过程中而不断发生改变的,导致身份不断变化的主要有两个向量:一个是相似性和连续性的向量,它主要对应于“传统”;另一个是差异性和断裂性的向量,它主要对应于“他者”。这两种向量有时候是对立的,有时候又相互作用。霍尔特别强调,在两种异质文化发生“碰撞”时,差异性和断裂性往往占主导地位,“他者”(外来因素)总是试图改造原有的连续性,并力图成为后者的一部分,于是新的身份便诞生了^{[2]220}。由此可见,身份改变或者说认同新建是身份形成过程中的主要趋势,即使如上节所述,许多华人移民因“相似性和连续性”的影响而执着于传统、持守于既有的“中国”身份,但传统也是在阐释中不断变化的,“中国”也是在创作中呈现不同含义的(有历史中国也有现实中国、有实体中国也有想象中国、有故土中国也有原乡中国、有地理中国也有精神中国、有文化中国也有美学中国等),所以人们持守的东西往往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只不过是持守者在观念中赋予其一种相对固定的审美形式而已。新变是认同的本质,“获得身份”是人类身份构成的主流。

东南亚华人的认同现实也印证了这一观点。无论是老一代华侨还是新生代华侨,他们或因主动选择,或受环境所迫,或被政策驱使,或为生存需要,主动或被动地改变自己的身份、更新自己的认同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一现象自然也在诗歌中有所反映,马华诗人吴岸的《祖国》一诗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轮船的汽笛刺破了静空/五月的黎明
在头上颤动/人心抖了,当快乐和悲哀/炽
热地在人们的胸膛里沸腾/一个白发的老
妇在船舷上哭泣/一个青年在她的身边向
她低语/是母亲在送别自己的骨肉?/还是

儿子在送着母亲远去? /

再次的笛声宣布了时刻已来临/送行者依依地挤下船梯/轮船和码头,儿子和母亲/在飞动的手巾里逐渐远离/远了,然而老妇人的哭泣声/清晰地隆隆声里低回/看不清那青年是否也流泪/只见河水在码头下激荡! /

祝你一路平安,母亲/不要为你的儿子忧伤/当你在怀念着你的祖国/当你的祖国在对你呼唤/那里正是温暖的春天/你的一别多年的祖国啊/枝头上累累微笑的枇杷/将迎接你的归来/

你的祖国曾是我梦里的天堂/你一次又一次的要我记住/那里的泥土埋着祖宗的枯骨/我永远记得——可是母亲,再见了! /我的祖国也在向我呼唤/她在我脚下,不在彼岸/这蕉风椰雨的炎热的土地啊! /这狂涛冲击着的明暗的海岛啊!

我是个身心强健的青年/准备为我的祖国献身/祖宗的骨理在他们的乡土里/我的骨要埋在我的乡土里/再见了,我的亲爱的母亲/轮船消失在河流的远方/拥挤的码头只剩下一个青年/只有河水依然在激荡! /

从此他告别了自己的欢笑/从此他告别了自己的悲哀/当他疾步走在赤道的街上/他就想着祖国偏僻的村庄! /^[15]

这是一首立意新颖的诗。我们读过许多古往今来的送别诗,大都是描写母亲送别儿子、妻子送别丈夫,或者朋友相送,然而《祖国》一诗却脱出窠臼,独出机杼地描写儿子送别母亲。这一独特的送别场面赋予了诗歌特殊的意义,即诗歌描写的不仅仅是一次亲人间的送别,而且也是一次身份的选择、认同的取舍。因为离岸远去的不仅仅是母亲,也是诗人文化上的母体;而诗人脚下坚守的不仅仅是一方热土,更是他当下认同的祖国。因此,这一次送别,实际上是告别原有的身份依恋,宣示新的认同的产生。

这是一首情事交融的诗。全诗初读之下,给读者首要印象的无疑是一首叙事诗,它完整地叙述了一次母子送别的场面:临行前的呢喃

低语,送别时的依依不舍,离别后的崭新期盼,可以说叙事元素非常完整。然而这又是一首情感浓烈的抒情诗,诗歌有着相当强烈的自白意识,甚至是用充满着强大势能的誓言般的呼告,如“你的祖国”与“我的祖国”的明显分际,“再见了母亲”的决绝,“准备为我的祖国献身”的告白,都在表达出诗人对新的祖国的确认和忠诚。

这是一首结构并置的诗。诗歌首先展现出空间的并置——“母亲”的长满枇杷树的祖国和“我”的充满蕉风椰雨的祖国在诗中形成了泾渭分明的态势,其次是时间的并置——“母亲”对历史的记忆与“我”对未来的承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此基础上再产生了情感的并置——“母亲”急切地北归和“我”坚定地南下,以及认同的并置——“母亲”和“我”都依恋和忠于各自的祖国。诗人运用一系列并置,并不是想构造一种平衡的表达效果,而是想突出和强化自身的身份选择。应该说,借助于第一人称的抒情效果,这一目的达成得非常圆满。

此外,烘托手法的运用——用激荡的河水衬托诗人的心情,标志性语词的使用——如“五月的枇杷”“蕉风椰雨”“赤道”等,以及首尾的遥相呼应——快乐和悲哀的“沸腾”与“告别”,都在不同层面强化了诗歌的艺术魅力。

综上所述,东南亚华文诗歌用独特的艺术手段,多角度地展现出流散群体认同的复杂性。这种复杂,其实不仅仅表现为迷失、分裂、持守、新变种种外在的表象,还包含着这些表象背后各种复杂的动因,诸如文化归属、生存策略、情感选择等等。这些内因不仅使认同的表象维度有可能不断地发生相互转化(即今日之持守也许化作明日之新变),而且有时也会使对表象的确认产生犹疑:持守是一种绝对的忠诚还是一种权宜的应对?新变是一种毅然的选择还是一种调和的智慧?认同是否就能融合?融合是否就能亲和?因此,认同作为一个与自我、他者、生存、文化、情感、现代性、意识形态等基本问题都有关联的现象,其内涵和外延都十分幽缈广博。海外华文文学对这一现象的呈现,不仅仅传达出流散群体对自身文化属性各种不同的认

知与选择,而且也揭示出人类当下普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明与自然、迁徙与坚守等一组组二元对立的关系面前,现代人往往被“无根”的焦虑、认同的迷惘、失去家园的痛苦所缠绕。在此背景下,认同的危机,甚至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使海外华文文学明显具有一种特殊的世界意义。尤为重要的是,在认同问题的促迫下,海外华人在异质环境中主动或被动地运用文化传统所蕴涵的智慧去解决因认同带来的各种问题,从而在此过程中逐步凝练出一种植根于流散生活经验的“文化新质”。这种文化创生,也许最能从本质意义上展现海外华文文学的独特价值。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才能准确理解东南亚华文诗歌中关于原乡或异乡的一曲曲吟唱,也才能深度体悟东南亚华文诗人对于自我与他者、故乡与异乡的一次次追问与反思。

[参考文献]

- [1] 阎嘉. 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J]. 江西社会科学, 2006 (9).
- [2] 斯图亚特·霍尔. 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C]// 罗刚, 刘象愚. 文化研究读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 [3] 钱超英. 流散文学与身份研究[J]. 中国比较文学, 2006 (2).
- [4] 张颐武. 认同的挑战[N]. 羊城晚报, 1998-11-24, (14) “花地”海外华人文学研究专版.
- [5] Cf. Wang Gungwu. *Roots and Changing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M]. in *Daedalus*, (Spring 1991).
- [6] Edward Said.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7] 方昂. 鸟权[M]. 吉隆坡: 千秋事业社, 1990.
- [8] 拉康. 拉康选集[M]. 褚孝泉,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1.
- [9] 熊国华, 选编. 海外华文文学读本·诗歌卷[M].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9.
- [10] 朱崇科. 认同点染与本土强化——论新华文学中的鱼尾狮意象[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6 (3).
- [11] Ralph Linton. *The Study of Man* [M]. New York: Appleton Century, 1936.
- [12] 饶芃子. 比较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 [13] 云鹤, 主编. 东南亚诗刊·创刊号[J]. 2006.
- [14]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 赵旭东, 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 [15] 吴岸. 盾上的诗篇[M]. (马来西亚) 麻坡: 南风出版社, 1988.

[责任编辑 吴奕锜 责任校对 王桃]